

第三期
2008年12月
December No.3



Winter 2008

亚洲研究动态



北京外国语大学 韩国高等教育财团 主办



出版人

金在烈 韩国高等教育财团事务总长
郝平 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长

编委会顾问

周其凤 北京大学校长
顾秉林 清华大学校长
陈佳贵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纪宝成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
王生洪 复旦大学校长
饶子和 南开大学校长
郝平 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长
苏志武 中国传媒大学校长
程伟 辽宁大学校长
金柄珉 延边大学校长
Mai Trong Nhuan 越南国立大学校长
Pirom Kamol-Ratanakul 泰国朱拉隆功大学校长
Sorn Samnang 柬埔寨皇家学院院长
Soukkongseng Saignaleuth 老挝国立大学校长
Tserensodnom Gantsog 蒙古国立大学校长

编辑委员会

吴志攀 北京大学亚太研究院院长
王孙禺 清华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张友云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冯俊 中国人民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吴景平 复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名誉主任
杨龙 南开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丁俊杰 中国传媒大学亚洲传媒研究中心主任
陆杰荣 辽宁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金虎雄 延边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Bouadam Sengkhamkhoutlavong 老挝国立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Pho Kaung 缅甸仰光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Prapin Manomaivibool 泰国朱拉隆功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Sodnomtseren Altantsetseg 蒙古国立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Sum Chhum Bun 柬埔寨皇家学院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Vu Ngoc Tu 越南国立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张西平 北京外国语大学亚非学院院长
郭栖庆 北京外国语大学世界语言与文化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赵宗锋 北京外国语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
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执行副主任

编辑部

主任 赵宗锋
成员 谷晨曦 王惠英
装帧设计 蔡颖
E-mail: icwar@bfsu.edu.cn
电话: 86-10-88813844, 88813845
传真: 86-10-88813842
地址: 中国, 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2号,
北京外国语大学
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 100089

目录

Winter 2008 December No.3

特稿

- 04 北京论坛(2008)圆满落幕
- 06 第六届亚洲研究中心主任会议在海口召开
- 07 亚洲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2008成功举行

学术活动

- 10 2008东北亚论坛在辽宁大学举行
- 11 第二届国际现代汉语诗歌学术研讨会在美国波士顿举行
- 12 首届图们江学术论坛2008在延边大学举行
- 14 2008第六届亚洲传媒论坛国际学术活动周举行
- 16 中国南亚国际学术论坛暨纪念谭云山、师觉月诞辰110周年学术研讨会举行
- 18 国际儒学论坛·2008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



研究机构

- 20 土耳其爱琴大学突厥世界研究所简介
- 22 荷兰皇家语言学、国情与文化人类学研究所简介

研究进展

- 23 从梁启超对东亚智慧两极评论说开去
- 26 东亚文化圈和东亚价值观的历史考察
——以中日韩(朝)为主体的历史分析
- 30 树立文化自觉,推进海外汉学(中国学)的研究



北京论坛（2008）圆满落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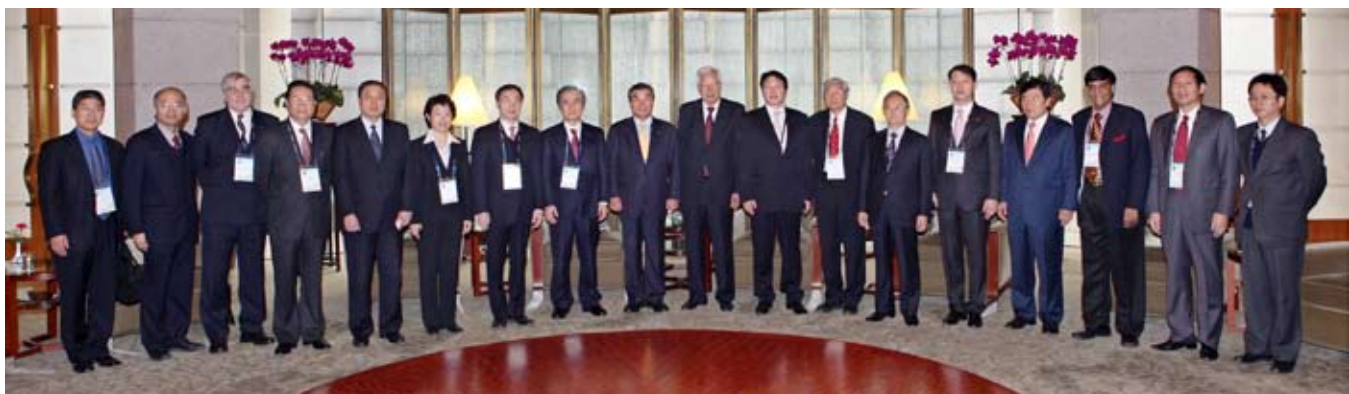
第五届北京论坛——北京论坛（2008）于2008年11月7日至9日在北京隆重举行。来自44个国家和地区的314位知名专家学者围绕着“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文明的普遍价值和发展趋向”这一主题，在“生态文明：环境、能源与社会进步”、“传统与现代的国家建构与政治文明”、“艺术的超越与文明的发展”、“奥林匹克精神与世界和谐”、“世界政治变迁与文明的互动”、“研究型大学圆桌会议：国际合作与大学发展”等六个领域对当今全球化时代下人类社会发 展所面临的诸多问题进行了热烈的探讨。本届论坛共收到论文摘要255篇。参加本届论坛的还有来自23个国家和地区的53位大学校长。北京论坛（2008）为金秋的北京增添了浓厚的学术气氛，成为一次令人瞩目的盛会。

全国政协前副主席罗豪才、北京市副市长赵凤桐、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司长张秀琴、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主任刘利民、北京大学校长许智宏、韩国SK集团董事长崔泰源、韩国SK集团副董事长崔再源、韩国高等教育

财团事务总长金在烈等出席了开幕式。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韩启德应邀发来书面致辞。2007年诺贝尔和平奖共同获得者——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副主席默罕·穆纳辛何，日本东京大学校长小宫山宏，英国历史协会副主席哈里·狄更森和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王辑思做了大会主旨报告。联合国副秘书长沙祖康出席了11月9日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举行的北京论坛（2008）闭幕式并做了精彩发言。

中国国务委员刘延东于11月7日下午在钓鱼台国宾馆特别接见了部分北京论坛（2008）的参会代表并发表重要讲话。刘延东对论坛五年来的连续举办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北京论坛在五年前就提出了‘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这个主题，表现了北京论坛的远见，因为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对我们现在的世界非常重要。追求和谐是中国文化的基本价值取向和基本精神。在当代，和谐观念可以成为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不同文化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





一个基本价值标准。”最后，刘延东预祝北京论坛圆满成功，并与在场代表合影留念。

在11月7日至9日的会期里，北京论坛（2008）的5个分论坛和1个圆桌会议共举办20多场次的专题讨论。中外学者依托北京论坛的学术平台，围绕“人类文明的普遍价值和发展趋向”这一问题发表真知灼见，并产生了诸多思想的共鸣和丰富的学术成果。其中，在北京论坛（2008）研究型大学校长圆桌会议上，来自全球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大学校长齐聚一堂，就“国际合作与大学发展”的话题进行了交流与讨论。大学校长圆桌会议为介绍成功的国际化教育的模式和理念，促进国际高等教育界开展交流与合作提供了一个极佳的平台。

为庆祝北京论坛创办五周年，“北京论坛之夜暨第四届东亚四国大学合唱节”音乐会于11月8日晚在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举行。音乐会上，东亚四国（中国、日本、韩国、越南）大学生合唱团同台演绎了一场视听盛宴和文化经典。“北京论坛之夜”作为北京论坛的又一文化品牌，受到了与会学者的高度赞誉和强烈反响。

北京论坛创办于2004年，是经中国国务院和教育部批准，在北京市政府的指导与支持下，由北京大学、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和韩国高等教育财团联合主办的国际性学术会议。第六届“北京论坛”将于2009年11月6日至8日在北京举行。

北京论坛每年举办一次，以“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为总主题，每年设有不同的副主题和分主题，紧扣时代发展主流，强调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下，从人文社会科学的角度展开对“和而不同”的文明相处方式的探索。至今累计有2100多名来自世界五大洲的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内外名流政要和著名专家学者参加了北京论坛。

五年来，北京论坛一直坚持以“文明和谐”为核心价值，不断寻求模式的创新、丰富论坛的内涵、适应社

会的发展。它的定期举办，是将“和谐世界”理念运用于人文社科领域的重要实践。

北京大学亚太研究院



第六届亚洲研究中心主任会议在海口召开



2008年12月6日至9日，由韩国高等教育财团资助、北京外国语大学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承办的第六届亚洲研究中心主任会议在海南省海口市召开。来自韩国高等教育财团和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中国传媒大学、辽宁大学、延边大学、北京论坛、上海论坛、老挝国立大学、蒙古国立大学、柬埔寨皇家学院的代表参加了会议。

本次中心主任会议主题为“建设高水平的亚洲研究中心：信息共享与交流合作”。韩国高等教育财团事务总长金在烈、蒙古国立大学校长Tserensodnom GANTSOG在会议上致辞，祝贺第六届亚洲研究中心主任会议召开。主题报告分两阶段进行，各亚洲中心的代表和北京论坛、上海论坛的代表逐一作了发言，对各中心一年来的工作和未来的发展进行了深入总结和全面展望。

第一阶段主题报告会由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常务副

院长、中国人民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冯俊教授主持。文春英老师代表中国传媒大学丁俊杰副校长介绍了第六届“亚洲传媒论坛”和亚洲传媒研究中心未来的工作构想；Adiya Sainbayar博士介绍了蒙古国立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的特点；郭有德副主任对“2008年上海论坛”进行了回顾，并介绍了“2009年上海论坛”的筹备工作；薛力博士介绍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博士论坛”的相关情况，并对论坛未来的发展进行了展望；程郁缀副院长、杨龙主任分别介绍了北京大学亚太研究院和南开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一年来的工作进展。

第二阶段主题报告会由复旦大学副校长、上海论坛组委会秘书长许征教授主持。严军秘书长对刚刚落幕的“2008年北京论坛”进行了详细的回顾；金光耀主任、金香海副主任分别介绍了复旦大学和延边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的工作；宋有涛处长介绍了2008年9月在辽宁大学举办的“2008东北亚论坛”；Sounthone Phommasonne主任、SAN Soravuth副主任分别就老挝国立大学和柬埔寨皇家学院亚洲研究中心的工作进行了介绍；唐忠副主任介绍了11月29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的“国际儒学论坛·2008”，以及中国人民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的工作；郭栖庆教授以“加强亚洲研究的信息资源库建设”为题介绍了北京外国语大学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成立一年来的工作进展。各亚洲研究中心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工作交流。

会议还讨论了建立世界亚洲研究联盟的有关事项，韩国高等教育财团和会议代表一致表示，希望由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长担任这一联盟的负责人，并将联盟的秘书处设在北京外国语大学。

最后，韩国高等教育财团金在烈总长和北京外国语大学郝平校长对会议进行了总结。

北京外国语大学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

亚洲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2008成功举行

2008年12月6日至9日，北京外国语大学成功举办亚洲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2008，第六届亚洲研究中心主任会议、北外承办海外孔子学院年会也同时举行。会议由北京外国语大学主办，海口市外事侨务办公室协办，韩国高等教育财团资助。来自世界20多个国家的150多位专家学者在这里聚会，就亚洲文明与世界文化交融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讨。

12月7日上午，亚洲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2008及第六届亚洲研究中心主任会议、北外承办海外孔子学院年会开幕式在海口市举行。北外副校长金莉主持开幕式，党委书记杨学义，校长郝平，海口市市长徐唐先，韩国高等教育财团总长金在烈，海口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王云霞，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常务副院长冯俊，匈牙利罗兰大学校长胡岱茨·费伦茨，德国杜塞尔多夫大学校长拉碧士，蒙古国立大学校长Tserensodnom GANTSOG，老挝国立大学校长Soukkongseng Saignaleuth教授，延边大学校长金柄珉，复旦大学副校长许征，山东大学副校长陈炎，中国传媒大学副校长丁俊杰，中国社会科学国际合作局副局长张友云，西藏大学副校长王启龙，比利时列日大学副校长洪德·弗朗索瓦，日本大东文化大学前校长和田守，保加利亚索非亚大学前校长费多托夫，海口市外事侨务办公室主任韩斌，世界汉语学会会长陆俭明和国内外一大批知名学者出席开幕式。

开幕式上，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长郝平教授、海口市市长徐唐先、韩国高等教育财团事务总长金在烈分别致辞。

郝平校长在开幕式上指出，与世界的其他地方相

比，亚洲拥有多样的价值体系、信仰体系和多样性的文明，亚洲研究是一个重要学术领域。最近20年，随着亚洲在世界格局中地位的上升，世界范围内的亚洲研究蓬勃发展。欧洲一些国家，很早就开展了亚洲研究领域的合作，在亚洲地区，也应当充分开展这样的交流合作。北京外国语大学致力于构建亚洲研究的学术资源网络。2007年12月，在韩国高等教育财团的资助下，成立了“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Information Center for Worldwide Asia Research at BFSU），这是世界范围内唯一以“亚洲研究信息汇总”为主题的科研机构。中心通过出版《亚洲研究动态》中文版、资助信息类课题、建设中心信息库等多种形式，致力于展示世界范围内亚洲研究的最新成果，增进亚洲研究机构之间的了解与沟通，构建亚洲研究的学术合作网络和信息资源库，成为





世界亚洲研究的学术交流基地。目前北京外国语大学正在韩国高等教育财团和其他亚洲中心的支持下，筹备成立亚洲研究联盟。联盟旨在将世界范围内的亚洲研究机构和学者联合起来，促进亚洲研究各个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促成全球亚洲研究网络体系的形成，为亚洲文明和价值观的世界性推广做出贡献。

市长徐唐先代表海口市政府和183万海口市民，热烈祝贺“亚洲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2008”在海口隆重召开，并对出席此次研讨会的各位专家、各位来宾表示热烈的欢迎。他在致辞中说，此次研讨会是促进亚洲文明和世界文化交融的一次盛会，中国有句古话“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能够在海口欢迎与会的各国朋友并协办此次盛会，感到非常荣幸，对北京外国语大学选择在海口召开这次盛会，表示感谢。

金在烈总长在致辞中对北京外国语大学承办第六届亚洲研究中心主任会议，并举办亚洲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2008及北外承办海外孔子学院年会表示感谢。他说，世界历史和文明正处在一个新的历史转折点，包括中国文化在内的亚洲文化将在人类文明进程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我们应该致力于亚洲文化的复兴和亚洲价值在世

界范围内的推广。韩国高等教育财团以促进亚洲繁荣和进步、增进各国学术交流为一贯宗旨。在韩国高等教育财团的倡议下，本次会议提出了建立世界亚洲研究联盟的建议，联合世界范围内进行亚洲研究的学术机构，扩大亚洲研究领域的成果。

美国夏威夷大学安乐哲教授、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冯天瑜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主任张西平教授、云南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贺圣达教授，分别以“在世界新秩序中的儒教伦理”、“从梁启超对东亚智慧两极评论说开去”、“树立文化自觉，推进海外汉学（中国学）的研究”、“东亚文化圈和东亚价值观的历史考察”为题，在会上作了主旨发言。

亚洲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2008以“亚洲文明与世界文化交融”为总主题，设三个分会场：“世界格局中的亚洲”，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探讨亚洲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及未来发展的方向；“世界文明进程中的中国文化”，以世界文明进程的全球视角，审视中国文化的影响和价值，探讨和揭示中国文化在当代的普世性意义；“东亚文明与发展”，追述东亚文明的悠久历史，探讨东亚各国在全球化时代的机遇与挑战。在分会场，来自我校和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美国夏威夷大学、波兰哥但斯克大学、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西班牙庞比法布拉大学、芬兰赫尔辛基大学、日本法政大学、韩国庆熙大学等国际知名大学的80余位学者作了发言，并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与亚洲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2008同时举行的第六届亚洲研究中心主任会议，主题为“建设高水平的亚洲研究中心：信息共享与交流合作”。韩国高等教育财团资助的16家亚洲研究中心主任和北京论坛、上海论坛的代表出席了会议，并逐一作了发言。年会关注并深入探讨世界各国亚洲研究的历史、现状、学术成果和发展趋



势，对各中心一年来的工作和未来的发展进行了深入总结和全面展望。中心主任会议还讨论了建立世界亚洲研究联盟的有关事项，韩国高等教育财团和会议代表一致表示，希望由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长担任这一联盟的负责人，并将联盟的秘书处设在北京外国语大学。

“北外承办海外孔子学院年会”作为“亚洲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2008”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第三届孔子学院大会前夕召开，是“亚洲文明走向世界”的重要体现，也为各孔子学院参加全球孔子学院的交流与研讨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来自维也纳大学、罗马大学、克拉科夫大学、列日大学、夏威夷大学、杜塞尔多夫大学、罗兰大学、索非亚大学、帕拉茨基大学的9所孔子学院的23名中外方院长、理事出席会议。钟美荪副校长在致辞中指出，孔子学院作为传播中国文化的独特形式，是亚洲文化同国际文化融合的典型代表。各孔子学院在2008年逐步探索出了自身发展的特色之路，2009年我校将为各孔子学院的横向交流和资源共享提供优质服务。各国与会代表就孔子学院的办学模式和制度建设、品牌项目开发、师资培训和教材建设、可持续发展、2009年度集体项目策划等主题，

进行了深入、详细的探讨。

经过一天半的会议，圆满完成了预定的议程。在大会闭幕式上，北京外国语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杨学义教授致辞。他指出，亚洲研究是一个相对宽泛的学术研究领域，需要多学科、多角度的研究，不同学术背景的学者的交流和沟通尤其重要。本次大会出席会议代表人数较多，学术领域广泛；信息流量大，沟通交流充分；研讨深入，学术成果丰硕，会议的论文和发言学术方法严谨，观点新颖，富有学术创造力；会议期间，代表们加深了相互了解，增进了友谊。会议的成功举办，表明亚洲研究这一学术领域有着坚实的基础和光明的前景。对于今后的亚洲研究，他提出，要进一步加强研究机构间的交流沟通，重视学术信息的交流与合作共享，加强跨学科领域的沟通和交流，加大对现实问题的关注。他认为，本次会议，将亚洲研究领域的交流合作推进到了一个新阶段。亚洲文明的复兴和发展，会促进全世界的和平与繁荣，而亚洲研究领域的新进展，将为促进这一进程做出积极贡献。

在会议开幕前，北外校友、海南省委常委、海口市委书记陈辞会见并宴请了北外校领导杨学义、郝平、金莉一行。本次会议组织工作由北外世界语言与文化研究中心、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和科研处、孔子学院工作处、国际合作处等单位承担。来自北外各个单位的一批老教授和中青年学者参加了研讨会。

本次研讨会整合了北京外国语大学亚洲研究领域各方面力量，推进了亚洲研究领域的进展，对提升学校学术水平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研讨会也为在更大范围内推进亚洲研究的交流与合作提供了平台，对实现亚洲研究领域更深入和广泛的合作前景也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北京外国语大学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



2008东北亚论坛在辽宁大学举行

2008年9月18日，“2008东北亚论坛”在辽宁大学蒲河校区国际会议中心隆重举行。

本届论坛共邀请中外嘉宾计70余人参加会议。与会的领导和嘉宾有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专、辽宁省外事办主任崔德胜、辽宁省教育厅副巡视员闫崇民、辽宁大学党委书记王山教授、辽宁大学校长程伟教授、辽宁大学副校长陆杰荣教授以及法国、俄罗斯、美国、日本、韩国等驻沈阳总领事馆总领事及文化领事等人员、韩国高等教育财团国际学术部部长金泽先生等。

大会开幕式由副校长、亚洲研究中心主任陆杰荣教授主持。校党委书记王山教授致开幕辞，韩国高等教育财团金泽先生，省教育厅副巡视员闫崇民先生，省外事办主任崔德胜先生和省人大副主任王专先生分别致辞。

来自世界各国研究公共事务治理的专家有日本同志社大学教授新川达郎教授、韩国高丽大学崔兴硕教授、韩国庆熙大学副教授郑锺弼先生、韩国庆熙大学副教授朱宰佑先生、中国-东盟项目资深专家韩标先生（英国）、康庄先生（德国）等；台湾政治大学詹中原教授、台北世新大学教授邱志淳、台湾淡江大学副教授

黄一峰、澳门大学教授林明基、中山大学教授任剑涛、南开大学教授杨龙、复旦大学教授顾丽梅、兰州大学教授包国宪、苏州大学金太军教授、燕山大学宋效中教授等三十多位；辽宁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国际关系学院、经济学院、日本研究所、比较经济体制研究中心等十余位相关院系教师及研究生二百余人参加了此次论坛。

本届东北亚论坛的主题是“走向亚洲良好的公共事务治理：能力发展与制度创新”。在大会主题发言阶段，程伟校长以“东北振兴与东北亚经济合作”为题做了精彩的发言，日本同志社大学新川达郎教授作了“建立街头参与政治：如何提高公民的权力意识和参与机制”的报告；来自韩国庆熙大学的郑锺弼副教授对“改变韩国与公民的关系：通过电子政府提高政府的透明度和公民的参与意识”方面进行了诠释；中山大学的任剑涛教授以“中国政府体制改革的政治空间”为切入点进行了精辟的论述。

论坛共设立了三个讨论单元，议题分别为，讨论单元一：问责制与公共治理；讨论单元二：参与和公共治理；讨论单元三：公共治理：亚洲经验。论坛总共收到三十五篇论文，到会的专家与学者就以上相关问题展开深入的交流与探讨，用全新的视角展示了近年来世界各地关于亚洲公共治理研究的新成果，为东北亚国家的公共管理模式选择及制度的完善提供了现实依据并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经过一天半深入热烈的讨论，会议于9月19日上午举行了闭幕式。闭幕式由郭永新副校长主持，程伟校长出席并致精彩的闭幕辞。论坛在浓郁的学术氛围中圆满结束。

辽宁大学亚洲研究中心



第二届国际现代汉语诗歌学术研讨会 在美国波士顿举行

2008年10月3日至5日，位于美国波士顿的西蒙斯学院(Simmons College)召开了第二届国际现代汉语诗歌研讨会，应邀出席的代表来自中国大陆、中国香港、台湾地区以及美国本土，不仅有华人，也有研究并翻译汉语诗歌的美国学者，还有美国诗人，包括尉雅风(Afaa m Weaver, 西蒙斯学院英文系)、吴思敬(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梁秉堃(香港中文大学)、奚密(Michelle Yeh,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院东亚系)、陆敬思(Chris Lupke, 华盛顿州立大学中文系)、梅丹理(Denis Mair)、洪淑玲(台湾大学中文系)、简政珍(台湾逢甲大学外文系)、绿蒂、黄亦兵(美国康尼狄克州立学院东亚系)、张耳、雪迪(美国布朗大学)、孟浪、周瓚(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王敖、马兰和北塔(中国现代文学馆)等30多人。

为了方便与会代表到哈佛大学去参观、访问、会友、办事，主办方特意将住宿地点安排在哈佛大学附近。诗会以中英文双语进行，分三个专题——“现代诗与翻译”、“现代诗与教育”以及“当前华文诗歌介绍与评析”。另外，还举行了诗歌朗诵、诗集及诗刊珍藏展等活动。

位于波士顿市内的西蒙斯学院是一所女子学院，由约翰·西蒙斯(John Simmons)先生创办于1899年，学生主要是黑人女学生。美国第一位黑人女大学生于1905年毕业于该校。目前该校的研究院已男女生混合，但本科还是女院。该校设有左拉·尼尔·赫斯顿(Zora Neale Hurston, 1891-1960)文学中心，其创办人和主任尉雅风先生是国际现代汉语诗歌研讨会的发起者和主持人。他遵循西蒙斯的传统，邀请了许多女诗人、女学者、女翻译参会。他希望通过举办汉语诗歌研讨会，让世界各地的汉语诗人或汉英双语诗人有机会展示他们的作品，有更多交流的机会，同时把更多的杰出汉语诗人介绍给美国读者。他也希望通过讨论会，进一步探讨当代汉语诗歌及其相关的一些现象和问题。

本届大会的重头戏是诗歌翻译的实践与讨论。先



分组进行翻译实践，每一组由两到三名精通英文的中国诗人和两到三名美国诗人构成，大家在一起讨论如何翻译中国诗人的某一首诗，从字到词到句子到意象到音韵到文化背景和哲学指涉，都反复细致地进行了研讨。在接下来的大会发言中，大家又谈了对这样的翻译实践的感想。参加者普遍感到，这是一种新鲜的形式，颇有启发。

这种中美诗人的同台翻译实践十分类似于古代“译场”。自汉末至北宋(公元二世纪末至十一世纪中)前后近九百年，佛经翻译差不多完全采用的是一种叫做“译场”的方式。这种译法有两大特点，一是分工合作，二是讲译同施。佛经译场当然设立于寺庙，同时也是一个庞大的佛学教育机构，精通梵文的高僧与一字不识的沙弥都可参加，高僧宣讲，沙弥听学。隋唐以后，“译场”转为精干的专家群体的小型翻译作坊，几人或者几十人在同一个经堂里翻译同一部经书。这是一种集体性的翻译行为，集中了参与者的智慧、学养、经验与手段，能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个人翻译中出现的种种问题。现代诗歌的创作也许不能集体化，但翻译是可以的，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更有优势。中国翻译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在不同时代，不同的人重译同一部作品(一般是文学名著)，交由不同的出版社出版。每一次重译当然能解决以前译本中留存的一些问题，但这是一



种社会资源和人力资源的浪费。“译场”等于是把不同时代的重译行为共时化，能够在初译时就解决掉许多问题，甚至能一次性造就一部翻译经典。许多佛经译本之所以能在千年之后依然站得住脚，成为“四库全书”的组成部分；就是因为“译场”的高质量保证。宋朝之后，“译场”基本上就不存在了。这恰恰说明，佛经在那之前已经有了完善的译本，“译场”完美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北塔在国内的某些场合曾表达对“译场”的羡慕和怀恋，希望在大学里讲授翻译课程的教授翻译家能够与同仁和学生一起重建“译场”，佛经不需要译了，但其它需要翻译的东西是无穷无尽的。没曾想，远赴美洲幸遇了“译桌”——“译场”之具体而微者。

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 赵倩 供稿

学术活动

首届图们江学术论坛2008在延边大学举行

由延边大学主办的首届“图们江学术论坛2008”于10月18日至20日在延边大学举行。“图们江学术论坛”由韩国高等教育财团资助，是以学术和文化研究、交流为主要内容的重要国际性学术论坛，拟筹办十届。

这次论坛以“多元共存和边缘选择”为主题，从当今经济全球化、地区一体化并进的国际大背景和多元文化共存的视角，盛邀各国学者对经济全球化给边缘地区带来的冲击和诸多问题进行广泛、多维和深入的学术研讨，并为图们江地区的和谐发展，世界多元文化的共存与交流提供政策建议和前瞻性的研究成果。

近年来，延边大学为迎接和积极参与即将到来的东北亚区域大开放、大发展的总趋势，审时度势，积极筹备主办高水平、高品位国际学术会议。此次论坛得到了国内外各方有识之士的广泛关注和高度重视，得到韩国高等教育财团支持。来自中国、美国、俄罗斯、朝鲜、韩国、日本、菲律宾等国家的60余名学者参加这次国际学术会议。两天来各国学者们分全球化与边缘、图们江流域的历史、世界中的朝鲜—韩国文化、东亚人文学的成就与课题等四个



金柄珉校长在开幕式上致辞



金在烈事务总长致辞

分论坛展开讨论,就图们江地区的历史、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相关议题进行深入探讨,达到了“图们江学术论坛2008”的关注地区性问题,汇集国际学术资源,打造高水平的学术平台,为多元文化共存和发展提供新的视角,为图们江地区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创新价值观的创办宗旨。

延边大学将以首届“2008图们江学术论坛”为发端,充分发挥学校的区域、人文、学科特色与优势,大力拓展与国内外的沟通与合作,将“图们江学术论坛”办成世人瞩目的高水平的东北亚地域文化学术平台。

10月19日下午,延边大学第二届卧龙学术奖颁奖仪式在综合楼七楼的学术报告厅举行。洛阳解放军外国语大学的张光军教授和延边大学的金宽雄教授获得了本次的卧龙学术奖。

颁奖仪式由延边大学朝鲜—韩国研究中心主任金虎雄主持,延边大学金柄珉校长和韩国高等教育财团金在烈事务总长为获奖者颁发证书及五千美元奖金,两位获奖者发表了获奖感言。

“卧龙学术奖”是由延边大学与韩国高等教育财团设立,每年评选一次,每次评选2人。学术奖的设立旨在进一步推动中国的韩国学研究的发展,其颁奖对象为中国国内从事韩国学研究并有重要贡献的优秀学者和专家,研究领域包括韩国语言、文学研究;韩国历史、韩中关系史研究;韩国哲学研究;韩国政治、经济、法律研究。

延边大学亚洲研究中心



与会各国学者合影



图们江学术论坛2008开幕式



各国学者分组进行学术讨论



金柄珉校长与金在烈事务总长和美国知名学者罗伯特·安东尼·斯卡拉宾诺先生合影



金柄珉校长和金在烈总长为获奖者颁发证书

2008第六届亚洲传媒论坛国际学术活动周举行



2008年11月15日至24日，“2008第六届亚洲传媒论坛”国际学术活动周在中国传媒大学举行。本次活动由中国传媒大学和韩国高等教育财团主办，亚洲传媒研究中心承办，公关舆情研究所协办，聚焦“国家形象传播”和“城市形象传播”两大主题，由国家形象传播论坛、城市形象传播分论坛、青年学术训练营、先锋学术讲座、亚洲电影周五大部分构成，邀请到来自中国、美国、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新加坡、以色列等18个国家和地区的200余位顶尖专家学者及业界精英。

（一）国家形象传播分论坛

15日至16日的国家形象传播分论坛由“国家形象与北京奥运”、“国家形象与国际传播”、“国家形象的自我描绘”、“中国的国家形象”、“国家形象与影视媒体”、“国家形象与品牌营销”、“国家形象与媒体

建构”、“国家形象的建构”八大分场构成，来自10余个国家与地区的近40名专家进行了主题演讲。

论坛开幕式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校长丁俊杰主持，中国传媒大学党委书记陈维嘉、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杨正泉、世界知识出版社总编辑沈国放致开幕辞。应邀出席的还有全国政协、中国新闻出版总署、国家广播电视电影总局、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等部门的相关领导。

八大分场中，国际奥委会新闻高级顾问Jeff Ruffolo（杰夫·纳弗罗）、韩国釜庆国立大学大众传播系副教授南寅勇、印度国际商务与媒体学院客座教授Keval J.Kumar（凯沃·J·库马）、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前副总编辑林良旗、泰国朱拉隆功大学文学院首席教授Prapin Manomaivibool（巴屏）、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传播学系讲师Andy Ruddock（安迪·鲁多克）、保加利亚索菲亚大学新闻与大众传播系首席助理教授Diana Petkova（戴安娜·白可婉）、日本庆应义塾大学媒体和传播学院研究员志岐裕子等中外专家学者发表了主题演讲。

在交流互动环节中，与会代表与听众就“北京奥运提升了中国的国家形象吗？”、“外国人眼中的中国形象与中国人的自我描述有多大反差？”、“国家是可以营销的吗？”、“中国该如何与世界沟通？”等问题进行了探讨。论坛首次从学术的角度和理论的高度全面、系统地总结了国家形象传播。

（二）城市形象传播分论坛

16日的城市形象传播论坛分为“城市品牌营销”、“城市发展战略与规划”、“全球化下的城市形象传播”、“城市形象建构”四大板块。国务院新闻办公室领导，各省市外宣办负责人、国内外城市形象推广专家、媒体代表等50余名国内外嘉宾应邀出席。

中国传媒大学副校长、亚洲传媒研究中心主任丁俊杰致开幕词。韩国首尔市政府城市营销担当官尹永硕、美国纽约市规划局前局长饶及人、美国国家地理频道亚

洲区副总裁郑楚卿、中央电视台CTR副总裁田涛等专家分别发表了主题演讲。

在交流互动环节里，专家与参会人员围绕着“中国城市如何能发掘、定义自己的城市形象”、“如何将城市规划的功能建设与城市形象建设融为一体？”、“如何既巧妙借鉴世界先进城市的经验又避免城市同质化？”、“城市之间如何寻求合作与共赢，建立区域战略联盟，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和谐发展？”等话题展开讨论。论坛的成功举办对塑造城市品牌及推动城市形象建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三）青年学术训练营

16日上午，为期半天的青年学术训练营召开。该活动以青年学生为学术交流的主角，从青年的视角切入，探讨了“国家形象与大众传播”、“国家形象的策略建构”两大议题。

来自中国传媒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等高校的8名博士生与硕士研究生发表了演讲。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问题研究中心的博士后研究员Ashley Esarey（叶叙理·埃萨雷）、荷兰莱顿大学政治学系助理教授Daniela Stockmann（达妮·斯托克曼）、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与新闻学院教授陈作平、中国传媒大学广播电视研究中心教授龙耘担任学术点评，中国传媒大学的25名营员参与了学术互动。这一平台为增进学生与国内外专家学者间的交流，提高青年学生的学术能力起到了推动作用。

（四）先锋学术讲座

14日至24日先后举办的9场先锋学术讲座中，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主编庄永志、以色列社会科学管理学院Ruppin学术中心的教授Eugene D. Jaffe（尤金·D·杰斐）、韩国圣公会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廉赞意、香港有线娱乐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徐小明等9名国内外专家学者应邀进行了演讲。他们和校内师生分享了媒体报道、电视及电影制作、公关危机管理等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并和听众展开了积极的交流互动。

（五）亚洲电影周

在17日至21日的亚洲电影周上，《春雪》、《外出》、《夺标》等6部知名亚洲电影陆续在校内播映。中博传媒公司的董事长陈伟明、导演张一白等4名电影专家先后到场进行电影点评并与师生展开互动交流。此次活动为提高校内师生对亚洲电影的了解，近距离接触一线电影制作者提供了平台。

“亚洲传媒论坛”是中国传媒大学亚洲传媒研究中心每年举办一期的盛大年度论坛，自2003年首次举办至今已连续成功举办了五届，累计有58个国家和地区的940人次参加。每年的论坛都会邀请世界各国，以及中国大陆及港澳台地区的传媒领袖、知名学者、业界精英参与，就相关的年度热点主题进行研讨和交流。经过五年的不懈努力，“亚洲传媒论坛”已被打造成在世界传媒界，具有较高知名度和号召力的论坛品牌，成为传媒领袖、业界精英共商发展大计的开放性合作平台，传媒学者共求学术创新的前沿基地，多元化思想碰撞与交锋的学术交流平台，为构建亚洲传媒研究的资源网络，促进跨文化交流和资源共享做出了积极贡献。

中国传媒大学亚洲传媒研究中心



中国南亚国际学术论坛暨纪念谭云山、师觉月诞辰 110周年学术研讨会举行

11月23日，中国南亚国际学术论坛暨纪念谭云山、师觉月诞辰11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外国语大学成功举办。本次会议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北京外国语大学亚非学院和海外汉学中心、北京大学和深圳大学等多家单位联合主办。

参加本次研讨会开幕式的贵宾包括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井顿泉先生和印度驻华大使拉奥琦女士等。北外党委副书记文君出席开幕式并发表讲话，祝贺研讨会开幕并预祝会议取得圆满成功。亚非学院院长兼海外汉学中心主任张西平教授主持了研讨会。来自印度、美国、加拿大和英国的多名相关领域知名学者前来参加此次会议。谭云山和师觉月的多名子女后辈也前来赴会。

文君副书记在发言中表示，谭云山教授和师觉月教授，作为中印交流的杰出使者，将永远被两国人民缅怀，而他们为中印交流作出的贡献与奉献精神是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有待我们进一步传承与发扬。

研讨会召开过程中，多名与会学者就中印文化交流、中印崛起与世界新格局等论题展开了热烈的发言和讨论。谭云山先生长子谭中教授在演讲中援引了季羡林先生的一段话来描述中国和印度两国的关系和地位：“中印两国同立于亚洲大陆，天造地设，成为邻国。从人类全部历史来看，人类总共创造出来了四个大的文化体系，而中印各居其一，可以说是占人类文化宝库的一半，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实。”谭中教授致力于中印文化交流，为继承和发扬谭云山先生毕生倡导的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

北外南亚研究中心主任郁龙余教授在研讨会上发言，并提交了论文《印度诗学的中国接受》。郁龙余教



授多年潜心研究中印诗学比较研究，其著作《中国印度诗学比较》被学界方家认为是该领域的“集大成之作”。郁龙余教授的著作《梵典与华章--印度作家与中国文化》在学界倍受称誉。温家宝总理在2006年记者会上引用了该书，表示2006中印友好年的重要内容就是“梵典与华章”，即中印文化的交流。郁龙余教授是本次“纪念谭云山、师觉月诞辰110周年学术研讨会”的倡导者之一。在研讨会召开之前，郁龙余教授还在深圳大学主持了“谭云山纪念馆”的开馆仪式。

北外亚非学院南亚研究中心客座教授董友忱先生在发言以及为本次研讨会提交的论文中表示：谭云山先生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中印两国人民间的文化交流事业，他为加强中印两国人民的友谊做出了不朽的贡献，因而赢得了两国人民的尊敬！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人民是不会忘记播撒友谊种子之人的！

谭云山是一位成就卓著的著名学者，曾经担任印度泰戈尔国际大学中国学院院长。他数十年致力于中国文化在印度的传播，对于推动中印文化交流做出了不朽的贡献。师觉月是印度佛学家、汉学家，曾任印



P. C. Bagchi as visiting Professor to National Peking University. 1947

度泰戈尔国际大学中国学院教授、副校长。他通晓古汉语、梵语和中亚语言，专门从事中印佛教文化交流史的研究。本次研讨会对谭云山、师觉月先生以及中印文化传播进行回顾，并探讨中印关系与世界发展的新格局，达到加强中印两国交流的目的。通过学术的交流与成果的总结，两国能够进一步加深文化上的了解，这对于两国交往具有积极的意义。

此次研讨会得到了学术界内的广泛支持。为预祝本次会议的成功举行，学界泰斗季羨林老先生欣然接受北外南亚研究中心主任郁龙余教授之邀，挥笔留下了珍贵的墨宝。此外，还有来自中国各地大学以及研究机构的学者们，来自印度尼赫鲁大学和德里大学的教授以及研究者对本次研讨会给予了全力支持，使得研讨会取得圆满成功。

为给南亚国际学术论坛营造良好氛围以及更好地普及推广南亚相关知识，北京外国语大学亚非学院还于11月19日至25日举办了“印度及南亚文化周”。文化周期间举行了系列活动，包括文化周开幕式、印度电影节、系列学术讲座和南亚图片展，以各种贴近生活的形式传递印度以及南亚文化内涵。

北京外国语大学亚非学院 佟加蒙 供稿



国际儒学论坛·2008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

11月29日，国际儒学论坛·2008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逸夫会议中心隆重开幕。150多名海内外儒学专家学者济济一堂，本次论坛的主题是“儒家仁爱思想的现代价值”。



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许嘉璐、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韩国高等教育财团总长金在烈、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常务副院长冯俊、日本早稻田大学前任校长西原春夫、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院长张立文、香港孔教学学院院长汤恩佳、香港仲盛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孔黛碧、美国夏威夷大学教授安乐哲等出席会议并在大会开幕式上致辞。大会由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冯惠玲主持。

纪宝成校长在致辞中，首先对与会代表致以热烈的欢迎和诚挚的感谢，并就此次研讨会主题展开了阐述。纪宝成校长认为，仁爱儒家思想的核心。它包括三个方面的含义：“己所不欲，勿施于



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今年的冰雪灾害和汶川大地震中，全国人民与灾区人民共渡难关，并持续对灾区给予帮助。这正是儒家仁爱思想的深刻体现。在新的时代，我们应当对儒家仁爱思想进行新的阐释，为当代中国的发展提供精神资源和动力支持。

许嘉璐先生发表讲话。他结合国内外的社会经济形势，提出，在危机重重的时代，“反思”必然成为世界的思想潮流。一个民族的思想核心凝聚在民族的经典之中，就中国而言，就是儒家经典。只有不断地回归经典，回归民族的价值根源，才能回应时代的问题，建造我们的意义世界。同时，他指出，儒学需要思考和研究，同时更需要在行动中实践。



金在烈总长在致辞中就儒家仁爱思想的现代意义展开了阐述。儒学不仅是中国、韩国、日本、越南等东亚国家的思想资源，而且是包括欧美等在内的全世界的重要思想资源。面对西方文明的危机，儒学的仁爱思想可以提供一条东方文明的解救之道。同时，儒学仁爱思想应该发展为适合现代社会的



世界伦理，才能使儒学具有生命力，使儒家伦理对人类发展产生更大推动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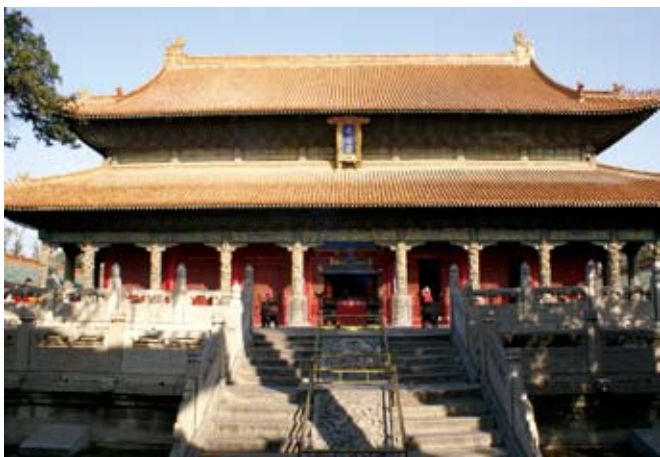
西原春夫教授发表讲话。他以日本军国主义时期的“杀身成仁”思想为教训，提出儒家仁爱思想的现代阐释必须注意的事项。如果把儒家仁爱思想作为国家的强制要求，二战时期的日本就是教训。如果把儒家仁爱思想作为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规范，则具有很好的发展前景。



冯俊教授在致辞中深情回顾了国际儒学论坛的历程。作为创办人和主办人之一，他认为，国际儒学论坛不仅致力于推动儒学的研究，同时也努力于构建儒学共同体，打造国际跨文化交流的桥梁。张立文教授在致辞中提出，仁爱是中华文化的最高道德原则和人格理想。

仁爱是每个人安身立命的所在，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价值标准。仁人具有一种伟大的担当精神。中华民族就是在这种大爱大德精神中成长、繁荣、生生不息。

论坛开幕式上，来自甘肃的农民杨正武先生为大会带来了自己珍藏35年的孔子画像，并自费加工制作。这种可贵的精神赢得了许嘉璐副委员长和孔黛碧女士的高度赞赏，全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持续不断，使论坛开幕式又掀起另一个高潮。这些都表明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推广和创新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和巨大的群众力量，



对于当今社会的存在与发展有着不可取代的价值。

在两天的会议中，国内外学者就“儒家仁爱思想的义理阐释”、“儒家仁爱思想的历史实践”、“儒家仁爱思想的宗教向度”、“儒家仁爱思想的当代价值”等问题展开广泛深入的讨论。

国际儒学论坛是中国人民大学与韩国高等教育财团联合主办的专题国际论坛，自2004年以来，已经连续举办了五届，并且已经成为很有影响的国际儒学盛会。本届论坛由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国学院、孔子研究院、亚洲研究中心共同承办。论坛把研究和弘扬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主题，致力于推动国内外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探讨和交流。

中国人民大学亚洲研究中心



土耳其爱琴大学突厥世界研究所简介



突厥世界研究所成立于1992年，隶属于爱琴大学。建所16年来，该所已经跻身于土耳其重要的学术研究机构行列。其主要研究方向是突厥世界，基本责任是就突厥世界进行高质量的学术研究，提供高水平的学术教育。突厥世界研究所可在5个不同领域培养硕士生和博士生。另外，该所还进行土耳其语教学，为来自世界各地的学子服务，帮助他们提高土耳其语水平以便能够继续在土耳其深造。

突厥世界研究所的学术建制：

该所主要包括6个系和一个土耳其语教学中心。其中6个系分别是：

1. 突厥民俗学系
2. 突厥世界文学系
3. 突厥艺术系
4. 突厥历史系

5. 突厥世界社会、经济与政治系

6. 突厥语言系

其中突厥世界社会、经济与政治系由于成立不久，建制尚不完整，学术人员人数尚未达到规定数额。而其它5个系都可培养研究生。该所的学术人员包括5名教授、2名副教授、9名助理教授、3名专家、22名研究助理。该所可提供包括汉语、俄语、波兰语、捷克-斯洛伐克语、保加利亚语、塞尔维亚语、克罗地亚语、波斯尼亚语等多种语言，几乎囊括了所有突厥民族的语言。另外该所还考虑到母语是其它语言的学生，比如日语或阿尔巴尼亚语，因此该所可教授的语言远不止各突厥语。突厥世界研究所的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土耳其、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以及突厥人曾经生活或仍在生活着的地区。

迄今为止，该所共培养硕士生和博士生82名，目前正在就读的硕士生有28人，博士生有76人。到目前为止，该所土耳其语教学中心共培养来自116个国家和地区的学生2405人。

突厥世界研究所的科研力量也相当雄厚，在过去一年中人均出版书籍1.0625本，在各种刊物上发表文章人均2.8125篇，在国家及国际学术会议上提交论文人均1.875篇。另外，在突厥民俗、突厥艺术和历史领域正在进行的科研项目总计12项。突厥世界研究所还有自己的半年刊杂志，该杂志属国际期刊。



研究所地址: Ege Üniversitesi Türk Dünyası

Arastirmaları Enstitüsü

35100 – Bornova – iZMiR

电话: 0 232 3884000 - 2096/2958

传真: 0 232 3427496

电子邮箱: tdae@mail.ege.edu.tr

突厥世界研究所所长: FİKRET TÜRKMEN 教授

电子邮箱: fikret.turkmen@ege.edu.tr

电话: +90-232-3390229

传真: +90-232-3427496

专业: 突厥语言与文学; 民俗学

突厥语言系: ZEKİ KAYMAZ 教授

电子邮箱: zekikaymaz_19@hotmail.com

电话: 3884000/2096转137

突厥语言系: GÜRER GÜLSEVİN 教授

网站: <http://www.gurergulsevin.com>

<http://site.mynet.com/gulseving>

电子邮箱: gurergulsevin@gmail.com

电话: 0.532.4621544 / 0.505.5009103

专业: 古突厥语; 土耳其语

突厥历史系: Turan GÖKÇE 副教授

电子邮箱: turan.gokce@ege.edu.tr

电话: 2096 -122 / 1882



北京外国语大学亚非学院 李智育 编译

荷兰皇家语言学、国情与文化人类学研究所简介

荷兰皇家语言学、国情与文化人类学研究所 (KITLV : Koninklijk Instituut voor Taal-, Land- en Volkenkunde) 是荷兰进行亚太地区 (主要针对印度尼西亚)、泛太平洋地区和加勒比地区 (主要针对苏里南、阿鲁巴和荷属安的列斯群岛) 科学研究的一个研究所, 其主要研究领域为: 人类学、语言学、历史和其他社会科学。研究所主页: http://www.kitlv.nl/home/main_page/。

KITLV成立于1851年。最初位于荷兰代尔夫特市内。KITLV成立之初的主要目的是满足荷兰国内对印度尼西亚研究的强烈需求。1864年, 当时位于代尔夫特的皇家学院进行重组, 该学院的许多学术工作被转移到了位于荷兰莱顿的“帝国研究所”, 但KITLV并没有一并迁往莱顿, 而是移址荷兰海牙。做出这一决定的主要原因是: 莱顿作为大学城, 拥有完备的图书馆设施和充足的图书馆藏, 因此对KITLV的资料并没有太大需求。而此后, 直到殖民时代终结, KITLV一直扮演着海牙的图书馆的角色。大约一百年后的1966年, KITLV再次迁址, 并最终落户莱顿的大学城。

1969年, KITLV与印度尼西亚科学研究所 (LIPI) 签订协议, 在雅加达成立了分支机构。该机构大量购置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与新加坡的出版物, 为KITLV的图书馆搜集资料; 对外出售KITLV的出版物; 并将许多原文为荷兰文的科学著作翻译成印度尼西亚文。

目前, KITLV正在进行着多项研究计划, 例如对印度尼西亚的政治和经济、荷兰后殖民主义移民潮、苏里南的历史以及亚太地区和非洲的经济发展的研究计划。

此外, 该研究所还在进行着以研究荷兰当年的殖民地情况及其所产生后果的项目“大西洋世界与荷兰, 1500 - 2000” (AWAD : The Atlantic World and the Dutch, 1500-2000)。以研究印度历史为主旨的项目“印度交叉点” (Indisch Knooppunt) 则包含了研究指南的编纂与采访的搜集。

KITLV在与其他大型研究机构合作项目的同时, 也为一些独立项目提供支持。

除了进行研究工作, KITLV也拥有大量文献、图片、档案和影音资料。这些资料不仅可以在该研究所的图书馆内查阅, 该研究所同时也提供网上信息查阅服务。

KITLV下属的出版社以出版印度尼西亚和加勒比地区相关的科学著作为主。每年约出版20册左右的图书, 绝大多数为英文书籍。该研究所还出版着三种期刊:

《语言学、国情与文化人类学期刊》(“Bijdragen tot de Taal-, Land- en Volkenkunde”) (英文期刊, 以介绍亚太地区和印度尼西亚为主); 《新西印度指南》(“New West Indian Guide”) (英文期刊, 以介绍加勒比地区为主, 有电子版); 以及与苏里南学研究促进基金会合办的一本期刊。

自2001年以来, KITLV成为荷兰皇家科学院 (KNAW : Koninklijke Nederlandse Akademie van Wetenschappen) 下属的研究所之一。

北京外国语大学欧洲语言文化学院 林霄霄 编译



从梁启超对东亚智慧两极评论说开去

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 冯天瑜

东亚文化是一个十分宽泛的概念，包蕴的内容极其丰富，人们对它的认识和评价难免见仁见智，各执一端。就西方而论，自18世纪以来，对东亚文化的观感，历来呈两极状态：一极以伏尔泰(1694—1778)、魁奈(1694—1774)等人为代表，对经验理性、仁爱精神等东方式智慧大加赞叹，并借以作为鞭答欧洲中世纪神学蒙昧主义的“巨杖”；另一极则以亚当·斯密(1723—1790)、黑格尔(1770—1831)为代表，他们透见了东亚文化发展的迟滞性，认定它是一个缺乏活力的系统，黑格尔还把“东亚智慧”的化身孔子视作“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从里面我们不能获得什么特殊的东西”¹。时至当代，西方人对东亚智慧的认识在逐步深化，但大体仍在上述两极间徘徊。

现代东亚人自身对东亚智慧的分歧之大，并不亚于西方人。这种分歧不仅指西化派对东亚智慧的贬斥与东方文化本位论者对东亚智慧的褒扬之间形成的强烈对比，而且即使在同一位东亚思想家那里，先后对东亚智慧的褒贬扬抑，往往形成巨大反差。如现代中国著名文化人梁启超(1873—1929)20世纪初叶评价东亚智慧的言论的骤变性，便是一个典型事例。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重要的革新运动——戊戌变法的领袖之一和主要宣传家。1898年变法失败后，梁氏流亡日本，潜心研习西方文化，以谋求强国之道；1899年，梁氏东渡太平洋，造访美国，目的是“誓将适彼世界共和政体之祖国，问政求学观其光”²。1903年2月梁氏再次离日游美，并于1904年2月在《新民丛报》增刊发表

《新大陆游记》，除大力推介美国的现代文明，特别是民主政治以外，还尖锐批评中国固有文明。梁氏在这部游记中列举“吾中国人之缺点”如下（仅引纲目）：

一曰有族民资格而无市民资格。

二曰有村落思想而无国家思想。

三曰只能受专制不能享自由。

四曰无高尚之目的。³

此外，梁氏还痛论中国人行为方式的种种不文明处，诸如：

西人数人同行者如雁群，中国人数人同行者如散鸭。西人讲话……其发声之高下，皆应其度。中国则群数人座谈于室，声或如雷；聚数千演说于堂，声或如蚊。……吾友徐君勉亦云：中国人未习会行路，未习会讲话，真非过言。斯事虽小，可以喻大也。⁴

1899年至1904年间的梁启超，对西方现代文明的仰慕，对东亚传统社会及文化的不满都溢于言表。

时过十余载，1918年12月，梁启超与蒋百里(1882—1938)、丁文江(1887—1936)、张君勱(1887—1969)等7人旅游英、法、德、意等欧洲列国，1920年1月离欧，3月回归上海。梁氏一行访欧期间，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西方现代文明的种种弊端一并充分暴露，一批西方人，尤其是西方的人文学者对西方文明持批判态度（德国人斯宾格勒1918年出版的《西方的没落》为其代表作），有的甚至对西方文明陷入绝望，并把希冀的目光投向东方。梁启超返回后发表的《欧游心影录》描述了这一情形：

1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119页。

2 《二十世纪太平洋歌》，《饮冰室合集》第5册，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7页。

3 《新大陆游记节录》，《饮冰室合集》第7册，第121—124页。

4 《新大陆游记节录》，《饮冰室合集》第7册，第126页。

记得一位美国有名的新闻记者赛蒙氏和我闲谈，他问我：“你回到中国干什么事？是否要把西洋文明带些回去？”我说：“这个自然。”他叹一口气说：“唉，可怜，西洋文明已经破产了。”我问他：“你回到美国却干什么？”他说：“我回去就哭起大门老等，等你们把中国文明输进来救拔我们。”⁵

曾几何时，在《新大陆游记》(1904年印行)中梁氏历数中国社会及文化的种种病态，认为惟有学习西方才有出路，而在《欧游心影录》(1920年印行)中，梁氏却一百八十度转弯，向中国青年大声疾呼：

我可爱的青年啊，**立正，开步走！大海对岸那边有好几万万人民，愁着物质文明破产，哀哀欲绝的喊救命，等着你来超拔他哩。我们在天的祖宗三大圣(指孔子、老子、墨子——引者)和许多前辈，眼巴巴盼望你完成他的事业，正在拿他的精神来加佑你哩。**⁶

这里梁启超申述的不仅是“东亚智慧救国论”，而且是“东亚智慧救世论”。必须指出的是，1920年的梁启超与1904年的梁启超相比，其爱国救世的热情和诚意别无二致，其笔端也都“常带感情”。然而，同样是这位有着赤子之心的梁启超，何以在十余年间对东亚智慧现世价值的评判发生如此截然背反的变化？

因篇幅的限制，这里不拟就梁氏个人的心路历程作具体分析，而只能简要考察梁氏十余年间对东亚智慧评价系统的变化，进而探求梁氏关于东亚智慧的两种极端之论提供的教训。

梁启超1904年撰写《新大陆游记》，洋溢着对传统东亚文化传统的批判精神，这是那一时代中国先进分子“向西方求真理”，以谋求现代化出路的必然表现。这种批判的出发点，是东亚社会及文化未能导引出现代化，而且其若干层面还成为现代化的阻力。梁氏由此出发所揭露的东亚社会及文化的种种病态，是中肯的，即使今日读来，人们也能产生会心之感。

梁启超于1920年撰写的《欧游心影录》，则是在对西方文明的弊端(或曰“现代病”)有所洞察后，再反观东方，发现东亚智慧具有疗治现代病的启示价值。这种以东亚智慧挽救现世文明的论断，虽然缺乏细密的历史分

析，然而其间也包蕴着若干真理的颗粒。

人们往往因梁启超1904年至1920年间的思想大转变而嘲讽他的“多变”，梁氏自己也曾以此类行径自嘲。但是，我们今天的认识不能停留于对梁氏跳跃式思维的一般性批评，而应当进一步考析：这种“大转变”、“大跳跃”报告着怎样的时代消息？今人应当从中获得什么启示？

简言之，梁氏的两种宏议，是近代中国面对多层次变革交会的一种反映：西方世界几百年间实现工业化与克服工业化弊端这两大先后呈现的课题，都挨肩擦背地竞相提到近代中国人面前，孙中山力主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同时又在中国资本十分薄弱之际便警告要“节制资本”，便是交出的一种答案。而梁启超于20世纪初叶的两种极端之论也是试交的一种答案，他1904年批评东亚社会及文化，其出发点是“现代化的诉求”；他1920年呼唤以东亚智慧拯救西方，拯救现代文明，其出发点则是“后现代的探索”。梁氏在短短十余年间发表两种极端之论，给人以荒诞印象，是因为他在尚未厘清前一论题时，便匆忙转向后一论题，更没有来得及对二者加以必要的整合。这当然是梁氏个人学术性格所致，但也是20世纪的中国及东亚世界面临文化转型的多重性所致——作为“后发展”的中国及东亚世界，以经济层面的工业化和政治层面的民主化为基本内容的现代化尚“任重道远”，而西方世界已经面临的“后现代”问题却通过种种渠道纷至沓来，陈列于东亚人(特别是东亚文化人)面前。这样，东亚人(特别是东亚文化人)一方面要扬弃东亚智慧的“前现代性”，以谋求文化的现代转型；另一方面，又要克服主要由西方智慧导致的现代文明病，此刻，东亚智慧又显现出其“后现代性”。梁启超敏锐地把握了东亚智慧在历史不同层面上的不同功能，各有精彩阐发，当然，还未能来得及加以必要的厘清与整合。

我们今日讨论东亚文化的现代价值，当然不应重蹈先辈的故辙，在“一味贬斥”与“高度褒扬”的两极间摆动，而理当历史地考察东亚智慧的生成机制和内在特质，既肯认东亚智慧创造辉煌古典文明的既往事实，又研讨东亚智慧未能导引出现代文明的因由，还要深思东

5 《饮冰室合集》第7册，第15页。

6 《饮冰室合集》第7册，第38页

亚智慧对疗治现代病的启示意义。在展开这些思考时，应当把握历史向度，充分认识当下中国社会及文化变革的繁复性，它包含着三个层级的变革的交叉互叠：

（一）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化，又称“第一次现代化”。自洋务运动建立机器工业以来，一直在进行此一转变，截至20世纪70年代中叶，中国的“第一次现代化”完成程度大约在50—60%，故1978年以来的三十年，还要继续完成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化的未竟之业。时至2005年，中国的第一次现代化指数为86%，世界排名56位，属于“初等发达国家”，或称半现代化国家，也就是说，时下的中国也还只完成工业化任务的大部分，估计到21世纪中叶中国方可全面实现第一次现代化（即工业化），成为“中等发达国家”。总之，改革开放三十年及今后几十年，中国首先要实现“第一次现代化”⁷，即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化。

（二）从国家统制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化。这是对“苏联模式”的突破，时下正在探寻计划体制与市场体制的辩证统一之路。前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体制是工业化的一种进路，作为一种“动员式体制”，曾取得显著实绩，但又存在严重的经济、社会及文化的僵滞之弊，终于在冷战较量中败下阵来。中国自1978年以来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便是对苏联模式（中国20世纪50—70年代中期模仿此种模式）加以扬弃，发挥市场的动力机制，使中国的经济、社会及文化赢得巨大活力，从而加速第一次现代化进程，并为第二次现代化的展开奠定基础。这是当下中国改革的重要内容。

（三）工业文明向后工业文明（知识文明）转化，又称“第二次现代化”。在全球化趋势下，发达国家正在经历的这一转化，也提上发展中国家的日程，当代中国也不例外。中国不必重走初原工业化的老路，而可直接采纳信息化时代的成果，取得“后发优势”，与此同时，生态危机、信仰危机等后工业时代的问题也呈现在当今中国面前，亟待我们解决，今天提出的建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便是得与后工业文明的启示。在第一次现代化尚未完成之际，又身历第二次现



代化大潮，是改革开放三十年及今后几十年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大特色。2005年中国的第二次现代化指数为40%，世界排名51位，与同年美国的109%、日本的102%、德国的93%、法国的92%、英国的91%尚存颇大差距⁸。改革开放三十年在完成第一次现代化任务的同时，也愈益深刻地接触到第二次现代化诸课题，而此一使命的展开可谓方兴未艾。

因此，近三十来传统文化现代转型，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古今转换，其面对的，不仅仅是初原意义的近代化（工业化），而是上述三个层面的转型的集合，这就意味着我们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较之单一的工业化时代更为复杂、深刻。例如，考察中华元典精神的现代转换，不仅要看到它们是构造近代思想的重要资源（如开掘民主精神、科学精神），而且还要发挥它们所具有的深远的后现代意义。

克服心醉西风的西化主义和夜郎自大的东方主义两种偏颇，是梁启超等先辈提供给我们的宝贵教训。以平允、周正的态度看待东亚智慧与西方智慧，努力谋求二者在各种不同层面的互补与整合，方有可能创造健全的新文明。

（本刊编辑部摘编自作者在
亚洲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2008上的主旨发言）

7 参见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 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中国现代化报告 2008》，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69页。

8 参见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 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中国现代化报告 2008》，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69页、第267页。

东亚文化圈和东亚价值观的历史考察 ——以中日韩（朝）为主体的历史分析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 贺圣达

本文拟对东亚文化圈和东亚价值观及两者之间的关系作一个历史的考察，进而分析传统的东亚价值观与构建当代价值观的关系。



一、古代：东亚文化圈的形成发展和东亚价值观的同一性

（一）东亚文化圈

古代亚洲存在着三大文化圈，即：以阿拉伯伊斯兰文为中心的西亚文化圈；以印度教、佛教以及相应的梵文和巴利文经典为共同经典的南亚文化圈；以汉文化尤其是儒学为中心、以汉文经典尤其是儒家经典为共同经典的东亚文化圈。严格意义上的东亚文化圈，在古代是以中国为主干，包括了朝鲜半岛、日本和越南三国。

东亚文化圈也可称为汉字文化圈或儒学文化圈，这是因为在东亚文化圈的构成要素中，从载体看最重要的就是汉字，而从价值观看，最重要也是影响最大的是儒家伦理。正是以汉字为载体，中国古代的经典才成为朝鲜、日本、越南等国共同的经典，中国儒学经典成为各国儒学之源头和经典，儒学才成为各国的官方意识形态，以儒家伦理为核心以儒学经典的理念观念为基本理念的价值观因此也成为东亚各国共同的价值观及其共同

的表现形式。

（二）东南亚总体上难以归入信奉东亚价值观的东亚文化圈

在早期文明演化过程中，它们更多地吸取了南亚印度文化（佛教和印度教），如中南半岛的缅甸、泰国、柬埔寨等国，或伊斯兰教（如15世纪以后的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儒家文化在古代东南亚虽有传导，但主要是在越南和中国移民较为零星的移居地。因此，把越南以外的东南亚地区整个地归入东亚文化圈的范畴，恐怕难以成立。

（三）古代东亚文化圈各国中东亚价值观的同一性

以儒学为主的汉文化在汉以后就逐渐传入越南、朝鲜、日本，但从汉文化传入这些国家到形成汉文化圈或东亚文化圈，尤其是到儒家伦理在这些国家真正深入人心，成为社会上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还有一个较长的过程。

隋唐以后尤其是宋明以后，由于儒学尤其是朱熹的理学在中国、越南、朝鲜半岛和日本都具有官方哲学的地位，统治阶级用各种方式向社会灌输儒家思想，《四书五经》成为王室、官员、学校和科场的必读经典，科举制度更加完善也更具社会影响，儒家伦理日益深入人心，“而汉字的词文网络还是儒学思想网络本身”。以儒家经典的语言表达的价值观，如忠孝仁义、礼乐教化、人伦纲常、亲亲法祖、和睦爱敬、勤政爱民、重农崇俭等观念被广泛接受和应用，因而就在东亚文化圈各国中，都有着相当高的同一性，逐渐形成相似的价值取向、伦价值观。

本文的分析，以14世纪以后东亚文化圈成熟时期的情况为主。

1、朝鲜：朱子学和儒家伦理的深入人心

朝鲜李朝（1392—1910）五百年间，儒家思想在社会思想领域里占据着统治地位，孔子被称为“素王”，

《四书五经》成为基本的经典和教材，儒教无异于“国教”。在教育方面，李朝由中央设最高教育机构，称成均馆，成均馆下设五部学堂。全国府、牧、郡、县无不设立乡校。“诸生读书，……常读四书五经及诸史等书，不挟庄老佛经杂流百家子集等书，违者罚。”朝鲜本国也出了不少理学家，最为著名和最有影响的，是被称为“海东朱子”的李退溪（1501—1570）和曹南冥（1501—1572）等。李朝以儒家思想来改造和稳定整个社会，儒家思想在李朝得到空前的繁荣和普及。因此，不少学者称李氏王朝为“儒教王朝”。

2、德川幕府时期（1603年至1867年）的日本：尊孔崇朱

德川幕府统治日本时期积极倡导儒学，由于各级统治者率先尊孔读经、兴办儒学教育、建孔庙以祀孔、输入及刻印儒家经典、鼓励从事儒学特别是朱子学的研究、推行社会性的教化活动等，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价值观成为国内占主导地位价值观。儒家道德观念如忠、孝、节、义、君有君道、父有父道、为臣尽忠、为子尽孝主张，以及“其尊卑贵贱之位，古今不可乱”的思想，在江户时代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伦理和价值观。

3、越南黎朝（1482-1784）和阮朝（1802—1884），以孔子思想为统治思想，独尊儒学，大力兴办儒学教育、实行以儒学为内容的科举考试、建孔庙祭祀孔子、推行社会性的教化、输入与翻刻儒家经典等，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灌输儒家伦理。越南封建王朝在积极推行以儒家伦理纳常为主要内容社会性教化活动方面，也是不遗余力，黎玄宗景治元年（公元1663年）特申明教化四十七条，颁行全国各村社。通过上述种种方式的灌输，儒学广为传播，孔子思想成为建立社会政治制度的理论依据，儒家伦理成为规范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基本信条，价值观的理念或语言表述如敬天、法祖、亲亲、求贤、礼乐、教化、爱民、重农等，也同同一时期中国的表述完全一致。

儒家伦理尤其是以朱熹为主要代表的宋儒提倡的儒家伦理在汉文化圈的中国、日本、韩国（朝鲜）、越南之所以有共同性，也与这几个国家东亚式的小农经济、皇帝（天皇）制度、

科举制度（在中、韩、越）或传统的知识分子精英（日本）及儒学治国，有着体系上的和深层次的联系。在没有这些相应的小农经济和政治制度、科举制度和其他一些制度的东亚国家（主要是东南亚国家，如印尼、马来西亚、泰、缅、老、柬等国），儒家伦理的影响就仅限于华人中，或只有相当微弱的影响了。

二、近代：东亚文化圈的瓦解和传统的东亚价值观的危机

从19世纪中叶开始，在西方侵略和西方思想的冲击影响下，东亚文化圈中，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发展道路也大不相同，各国统治集团或新兴力量、领导集团对儒家伦理作出了不同的反应，采取了不同的立场和态度，儒学经典在一些国家不再是经典甚至教学内容，儒家经典理念已不再是价值观的基本理念，儒家伦理导向的制度尤其是政治制度和科举制度衰亡，东亚文化圈遭受解体命运，儒学价值观作为体系已解体，传统的东亚价值观面临危机。

（一）中国：儒学体系统治地位的丧失和传统价值观体系的解体

中国在东亚文化圈中的地位和作用也发生了变化。19世纪中叶以后，面临西方的严峻挑战和社会急剧变化的现实，传统的儒学以及建立在儒家三纲五常基础上的制度已不能拯救民族危亡。1894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使得宣扬“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派宣告破产。清政府在1905年以后也不得不尝试“新政”，废除了科举制度。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则在海内外大肆鼓吹革命，宣传反对专制，实行共和，民权、平等等新价值观影响越来越大。“五四”运动中，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在新中国成立后，儒家思想几乎完全退出了本领域。



（二）近代日本：妄自尊大的东亚观和以变异的儒学作为国家道德准则

在中国儒学陷入危机并走向全面衰落的同时，日本企图以东亚传统的继承者自居，而日本统治层及为日本的“东亚”论服务的学界所看重和宣扬的是儒家伦理中强调“君臣父子”、“仁义忠孝”的思想内容，并把它与日本的“神道”相结合，以服务天皇制的秩序和在东亚的殖民统治，可以说是一种变异的“儒学”。打着“忠君爱国”“王道主义”、“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旗号，行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之实，对内镇压思想言论自由，对外侵略东亚各国，并在“王道主义”、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的旗号下利用孔孟之道实行奴化教育，对日本的现代发展和东亚各国都带来了危害。实在不能认为就是当时“东亚的价值观”。

（三）近代朝鲜：儒家伦理的危机和日本对传统儒学的利用

19世纪中叶以后，朝鲜外受欧美和日本不断侵略，内部封建统治出现严重危机。作为正统思想统治朝鲜达五百年之久的儒家思想，也逐渐丧失了权威。宣讲儒学的成均馆、书院等解体，陆续被新式学校所代替；推行了1000多年的科举制度至李太王三十一年（公元1893年）也被废除。受中国洋务派和日本明治维新的影响，在一部分人中形成了改革思想，主张以近代思想改造儒学。日本侵占朝鲜之后，遭到朝鲜人民的猛烈反抗，为了巩固殖民统治，转而利用传统的儒家思想，在学校重新开设儒学课程，在社会上则表彰“孝子节妇”，并大搞“振兴儒教”和“祀孔参政”等活动，企图借助孔子之亡灵和儒家伦理中的消极、腐朽的思想，美化殖民统治，以“王道主义”之名，行奴化朝鲜人民之实。

（四）殖民地越南：汉字、科举制度的被废除和新旧思想、伦理的冲突与并存

1884年《顺化条约》签订后，越南完全沦为法国的殖民地，法国对越南的殖民统治长达七十年来。1915年至1919年间，越南中部和北部先后正式废除了科举考试制度。在越南通行了千余年的汉字和以汉字为基础而创造的喃文被宣布废除，几乎所有的学校都改成了法、越文（拉丁化的文字）学校。儒学经典不再是受教育者必读的经典。越南与“汉字文化圈”渐行渐远了。

随着法国侵略、殖民程度的加深，由于社会经济

的变化和中国、日本新思潮以及西方的影响，越南思想界进入了一个新旧思想冲突与并存、逐步发生深刻变革的时期。从总体上看，儒家伦理的价值观作为一个体系已经破产。受西方（尤其是法国）资产阶级思想和中国从康有为梁启超的变法维新以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的冲击和影响，19世纪末20世纪初越南思想界出现了维新派。他们对儒学教进行了有分析的批判，主张变法改革，开发民智，富国强兵，发动了“东游运动”和“维新运动。”随着运动的深入，维新派中也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倾向：以潘佩珠（1868-1940年）为首的一批人，更多地受儒家伦理和近代中国思想家的影响，而以潘周桢（1872-1926年）为首的另一部分更多地受西方思想的影响，力图把儒家的“民为邦本”的思想和西方的社会伦理思想糅合在一起。

（五）新加坡：儒学运动和“东亚文化圈”在东南亚的新分支

如果从更加广大的地理范围看，从包括东南亚在内的地理的“东亚”看，那么，近代或19世纪中叶以后，当传统的儒家文化圈即中、日、朝、越组成的东亚文化圈由于各国社会经济和发展道路以及思想文化的不同而趋于解体的同时，在民间层面，儒家

文化却由于华人大量“下南洋”而在东南亚华人社会中得到广泛的传播；在东南亚的一些华人集中的国家和地区尤其是在新加坡出现了“儒学运动”，而且这个由民间发起的儒学运动呈现出与当时传统的东亚文化圈国家中儒学或遭到批评、质疑（在中、朝、越）或被政治上歪曲利用（如在日本）不同的特点，它主要通过教育的方式把非政治性的儒家伦理灌输到华人中，从而使新加坡以及东南亚较大的华人聚居地区成为汉文化圈在东南亚的分支、分叉。

在东南亚其他一些华人聚居的城市和地区，如马来西亚的槟榔屿、马六甲、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泗水等地，同一时期的儒学运动也起了类似的作用，对东南亚华人社会成为“东亚文化圈”的分支，作出了历史的贡献。

三、传统的东亚价值观与当代东亚价值观的构建

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日本二战后经济所取得的成就、亚洲“四小龙”经济的迅速发展以及中国的崛起，当代东亚的新发展、东亚合作甚至东亚共同体建设已成为东亚地区乃至当今世界关注的热点。儒家伦理、亚洲价值观、东亚价值观也成为学术界甚至社会关注的



问题，需要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际等各个角度、各个方面进行研讨。

（一）本文的历史考察，主要限于东亚价值观的核心儒家伦理，而实际上传统的东亚价值观虽以儒家伦理为核心，也应包括佛道等对于塑造中国人甚至东亚国家人士的精神世界和行为方式有着重大影响的其他各家的思想，其内涵要远比儒家伦理丰富，这是需要说明的。

（二）就以儒家伦理为核心建构的东亚文化圈和东亚价值观这一问题而言，以笔者浅见，无论“东亚文化圈”和“东亚价值观”不是一成不变的。在古代东亚，东亚文化圈与各国的价值观有高度的同一性，而在近代东亚文化圈实际上已趋于瓦解（尽管在东南亚有新的扩展），传统的东亚价值观面临危机，东亚文化圈各国以及各国不同立场和地位的人士尤其是新兴力量、阶层与传统体制的维护者对传统价值观的态度、看法、解说也大相径庭，甚至根本对立。这与传统的东亚价值观在古代东亚各国社会中具有高度的同一性并且占绝对主导地位是大不相同的。

（三）近代中国的案例表明，儒学及按照传统的儒家价值建立起来的制度作为一个体系，并不能解救民族危亡，近现代中国社会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需要新的理论指导、新的价值观，对儒学遗产应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而近代日本的案例则表明，作为文化主体的人，尤其是作为掌握国家政权的人若作出错误选择，将传统中的糟粕视为瑰宝，或别有用心地歪曲利用，搞什么“王道主义”“大东亚共荣圈”也会带来巨大的危害。日本军国主义者对儒学的恶用，就是典型例证。

（四）传统的东亚价值观与当代的东亚价值观，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不同的概念。传统的东亚价值观是以中国的儒家伦理为核心的价值观，这一价值观在汉唐以后，又被东亚文化圈的各国作为主导性或占统治地位并影响全社会的价值观。这一价值观的思想源泉是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及其经典著作，东亚文化圈内的日、朝、越等国的思想家也为传播、丰富传统的东亚价值观并使之本地化作出了他们的贡献。

至于当代东亚价值观，作为当代东亚各国和各国人民共同的价值观，我认为还在形成中，并没有形成；即使在传统意义上的东亚文化圈（包括今天的中、朝、韩、日、越各国），由于这一百多年来历史发展道路和

体验的不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上的差异和已经形成的价值观念的不同，对传统的儒家伦理能否作为当代“共同价值观”也还有不同的看法。但是，传统的价值观与当代价值观毕竟有着历史的联系，如果说这几个东亚国家相互之间在文化或价值观方面有什么共同的东西，那么，传统的文化和价值观还是重要的方面。至于什么是当代的“东亚价值观”以及如何形成，传统的东亚价值观在构建中的作用如何，更是一个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

（五）我们面临的是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一个新的经验。形成今天的东亚价值观也绝非依靠传统的东亚价值观的复兴，将它重新包装所能承担。对于今天的东亚价值观的构建，要在打破传统体系的条件下，全面清理、充分挖掘其极为丰富的内容中一切有价值的材料和理念，作为思想资料，加以时代性的诠释或保留其仍能为当代人接受的理念。只有这些价值理念具有当代的时代性，成为当代东亚各国在主流的层面上共同认可的价值观时，才可以说已经形成了当代东亚价值观，而且这样的“当代东亚价值观”有一个逐步构建过程。

（六）形成当代东亚的“共同价值观”的关键和难点，就是要立足当代、面向未来，在“存异”的同时，增强“求同”方面的努力。作为博大精深的传统的东亚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儒家伦理肯定有其积极作用的一面，这就需要取其精华，把继承和创新有机地统一起来，使之适应当代东亚发展的需要。当代东亚已不同于古代，各国在核心价值观方面显然有诸多的不同（例如，中国提出的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因此，形成“当代的东亚价值观”是一个新问题，这有待于东亚各国的共同努力，首先是学者的研究探讨。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仅探讨了中、日、朝、越等国儒家伦理观的共同性，而没有探讨他们之间的不同和差异；仅探讨了儒家伦理的影响，而没有探讨佛、道伦理在历史上对这四个国家的伦理也有着重要影响。因为那是一个更大的课题，笔者在知识上也还不具备探讨这一更大课题的准备。

（本刊编辑部摘编自作者在
亚洲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2008上的主旨发言）



树立文化自觉，推进海外汉学（中国学）的研究

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 张西平

【关键词】文化自觉 海外汉学 中西文化 东方主义



对海外汉学（中国学）的研究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已经成为学术界的一个被普遍关心的领域，一系列海外汉学的著作被翻译出版，一批研究海外汉学的学术著作问世。对海外汉学（中国学）研究的深入“意味着我国学术界对中国文化所具有的世界历史性意义的认识愈来愈深；——或许可以说，这是20年来我国人文科学的学术观念的最重要的转变与最重大的提升的标志之一。”¹

不过应该看到，西方汉学若从十六世纪的“传教士汉学时期”算起已有4百年的历史，若从“游记汉学时期”算起就要更长，而日本汉学（中国学）如果从中国文化的传入算起则有更长的历史，因而作为一门专门的学科研究来看，对域外汉学（中国学）的研究仍然不过刚刚起步，许多问题有待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许多课题有待研究。李学勤先生多次呼吁：“国际汉学的研究对于中国学术界来说，有着特殊的重要性。外国汉学

家几百年研究中国文化，自有不少成果我们应当吸收借鉴，但由于语言隔阂，这方面的成果大部分未能介绍到国内来。”²

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门学科，应采取什么样的学术路向来把握这门学科。对域外汉学（中国学）的研究无疑是一种跨文化，跨学科的研究，这样我们必须了解汉学在域外发生的文化和学术的背景，在不同的知识和文化背景下它的价值和影响。反过来说，这种发生在异地，由东洋人和西洋人所做的学问对我们中国本土的学术发展究竟有什么影响，我们应该用什么心态和什么方法来评价这种学问，如何和这些近在东京远在巴黎和哈佛的外国同行们对话和交流。从一定的意义上来说，搞清这些问题比研究汉学的一个具体问题要重要得多，特别是在汉学研究蓬勃发展的今天，学科对象与学科研究方法的问题已经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一、在中西文化交流史的背景下研究海外汉学（中国学）

如果将域外汉学（中国学）史作为一个学术的对象来把握，我们所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中国文化是通过什么途径传播到国外的？汉学家们所阅读的中文典籍是如何流传到他们手中的？他们所阅读的中文典籍的译本是如何形成的？因为任何一个汉学家，他从事汉学研究的基本条件就是要阅读中国文化的典籍，无论是原本的中文文献还是翻译的文本。

从前者来说，中文典籍的外传，构成了域外汉学家研究中国文化的基础，所以，正如严绍璁先生所说：“国际中国学（汉学）的基础性研究，就必须以原典性实证方法论，解明中国典籍向世界的传播，探讨这种传递的轨迹和方式，并从事收集、整理和研究相关的文

1 严绍璁：《我对国际中国学（汉学）的认识》，载任继愈主编《国际汉学》第5期，第6页，大象出版社2000年。

2 严绍璁：《我对国际中国学（汉学）的认识》，载任继愈主编《国际汉学》第5期，第6页，大象出版社2000年。

3 严绍璁：《我对国际中国学（汉学）的认识》，载任继愈主编《国际汉学》第5期，第6页，大象出版社2000年。

献。失却了这一基本性功能，所谓对国际中国学（汉学）的研究，都是无根之本，无源之水。”³这点严绍璎对中国典籍向日本的传播的研究，对整个汉学（中国学）史的研究都具方法论的意义，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搞清中文文献在西方的流传史，这直接影响我们对西方汉学史的研究。

从后者来说，西方大多数汉学家研究中国的文本使用的是各种西方语言的译本。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国与外部世界联结的通道是不同的，域外汉学家们所得到的翻译的文本是不同的，这些不同的文本决定了他们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例如，在西方汉学的历史上对《四书》的翻译就有罗明坚的译本，有柏应理的译本，有卫方济的译本，有理雅格的译本，有卫礼贤的译本，有陈荣捷的译本。这些译本由于时代不同，译者的文化背景不同，所表达的《四书》的含义有着很大的不同。因而，认真摸清中国典籍的外译是进行西方汉学史研究的基础性工作，虽然困难很大，特别是对传教士的早期拉丁语译本的梳理和研究，但从学术的整体和长远发展来说，应该去做。

如果这样从学术上掌握汉学的知识来源，我们就必须进入中外文化交流史的研究。由此，我们就可以理解在研究西方早期汉学时为什么我们一定要熟悉和了解入华传教士的活动，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费正清认为中西文化交流中入华的传教士扮演着“核心的角色”，因为入华的传教士实际上是站在一个双行道上，“他们在向西方传递中国形象的同时也塑造了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观点”，⁴不了解传教士我们就弄不清他们向西方所介绍的中国形象。

二、从学术史的角度把握海外汉学（中国学）的历史变迁

海外汉学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它们作为一个学术的发展，都有着自己的学术师承和学术脉络，我们今天在展开海外汉学的研究时应对各国汉学（中国学）的学术发展史有一个较为清晰的把握。讲到这个问题，首先就涉及到“汉学”和“中国学”的关系，一般来讲“汉学”表示对中国古代语言，文字，历史文化，典籍，制

度的研究，“中国学”表示对近现代中国社会历史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上前者注重文献，训诂；后者注重现实；前者基本上是传统的人文学科的方法，后者采取的是现代社会科学的方法。如刘东所说：“汉学一词在现代亦必衍生出宽窄两义。广义上，它可以指称‘一切在研究中国的学问’。狭义上‘汉学’（Sinology）一词则与以现代方法研究现代中国的‘中国研究’（Chinese Studies）相对，仅仅指以传统方法来考释中国古代文化特别是经典文献的学问”。⁵这种划分和理解也都是相对的，有分歧是正常的，语言的特质之一就是“约定俗成”，我们不必在学科的名称上长期争论。

但这两种名称告诉我们，西方对中国的认识和研究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我们应该对其学术史的流变和发展有个了解。对待域外汉学（中国学）仅仅采取一种实用的态度是不行的。“我认为研究国际汉学，应当采取学术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最重要的是将汉学的递嬗演变放在社会与思想的历史背景中去考察”⁶。前辈学者已经这样做了。1949年前对西方汉学通史的研究有莫东寅的《汉学发达史》和日本学者石田干之助的《欧人汉学之研究》，近年来有了一二本国别的汉学史著作，影响较大，受到国内外学者好评的是严绍璎的《日本中国学史》和侯且岸的《当代美国的‘显学’》。何寅与许光华的《国外汉学史》是国内目前较为详细的汉学的通史性著作，此书有开创学科通史之功。汉学（中国学）史研究的意义在于，域外汉学（中国学）的发展在各个国家都有其独特的历史，有自己的学术传统，有师承的传递和各个学派的特点，如果不了解这个历史，我们就无法判定一个汉学家在本国学术史的地位，也不能了解其学术思想的来源和背景，很容易闹出笑话。汉学家也分三六九等，要把最好的汉学（中国学）成果介绍到国内，就必须做深入，细致的国别汉学史的研究工作，“在此基础上，再来进行整体的或个别的研究。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认定各国的中国学家们在他们自己国家的学术谱系上的地位，才可以避免我们的无知”⁷。从西方汉学史来看，如果没有一个系统而又深入的学术史的梳理，你就无法解释“传教士汉学”和“专业汉学”之间的巨大变化，我们也无法解释从费正清到柯文这种学术

4 费正清著 吴莉译：《新教传教士著作载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载任继愈主编：《国际汉学》第9期，第121页，大象出版社2003年。

5 刘东：《国学与汉学—载二十世纪国际汉学及其对中国的影响》，载葛兆光主编：《清华汉学研究》第三期，第128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0年。

6 李学勤：《国际汉学著作提要》序，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

7 严绍璎：《我对国际中国学（汉学）的认识》，载任继愈主编《国际汉学》第5期，第14页，大象出版社2000年。



所以，无论是判断一个汉学家个人的学术成就还是从整体上理解汉学（中国学）的演变，没有学术史的研究是根本不可能的。

三、比较文化的视角是海外汉学（中国学）研究的基本方法

海外汉学（中国学）虽然其内容是关于中国的，但它是发生在域外，由外国人所做的学问，从西方汉学（中国学）来看，它是西方学术体系中的一个分支“东方学”的一部分。既然它是西学的一部分，它必然要遵循西方学术的传统和规范。这样汉学和国学之间既有同，也有异。同，则表现在内容上，无论是传统的汉学还是当代的中国学，材料，文献都是中国的；异，则表现在学术规范和方法上，最终还在问题意识上，它是从自身的文化发展的需要出发的，从一个“他者”的角度来看中国文化的。这样，在汉学（中国学）的研究中就必须从一种跨文化的角度，运用比较文化的方法来分析汉学。许多国内做“国学”研究的学者认识不到这一点，往往将“汉学（中国学）”和他们自己所从事的“国学”相等同，对其“同”的部分大加赞赏，认为有水平，对其“异”的部分大加批评，对汉学家们对中国文化和学术的“误读”不能给予一个合理的解释，究其原因，就是缺乏一种比较文化的视角，不能运用跨文化的研究方法来对待汉学（中国学）。如果从比较文化的视角来看待汉学（中国学），我认为以下两点是很重要的：

首先，母体文化对汉学（中国学）家学术视野和方法论的影响。从实证的知识论角度来看，域外汉学并非象赛义德所说的完全是一种“集体的想象”，也并非是在本国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完全影响下，它成为一种毫无

路向的重大转变，我们也不可能深入地了解这种学术转变背后的深刻文化原因。



任何可信的一种语言的技巧，一种没有任何客观性的知识。就西方的汉学（中国学）而言，从十六世纪以后，他们对中国的知识获得了大踏步的进展，“游记汉学”与“传教士汉学”的重大区别就在于，后者已经开始长期的生活在中国，并开始一种依据基本文献的真实地研究，它不再是一种浮光掠影式的记载，一种走马观花的研究，传教士汉学绝不是传教士们随意拼凑给西方人的一副浪漫的图画，他们对中国实际认识的进展，对中国典籍的娴熟和在翻译上的用功之勤，就是今天的汉学家也很难和其相比。特别是到“专业汉学”时期，汉学家在知识论上的进展是突飞猛进的，我们只要提一下法国的著名汉学家伯希和就够了。这点我们在下面论述汉学（中国学）和国学的关系史还会讲到。在这个意义上赛义德在其

《东方学》中的一些观点并不是正确的，“每一个欧洲人不管他会东方发表什么看法，最终都几乎是一个种族主义者，一个帝国主义者，一个彻头彻尾的民族中心主义者。”⁸由此，西方的整个东方学在知识论上都是意识形态化的，其真实性受到怀疑。他认为西方的东方学所提供的是“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的和帝国主义的定性概念”，因而，他认为，东方学的失败既是学术的失败，也是人类的失败。赛义德的观点显然不符合西方汉学的实际情况，作为西方知识体系一部分的东方学，它在知识的内容上肯定是推动了人类对东方的认识的，从汉学来看，这是个常识。

我这样讲时并不是否认西方汉学受其欧洲中心主义的影响，平心而论，赛义德说，西方的东方学是伴随着帝国主义的海外扩张而形成的，这说的是对的，东方学受到其西方文化的影响和制约也是对的。但由此认为西方的东方学“并没有我们经常设想的那么具有客观性”的结论缺乏具体分析。赛义德所提供给我们的从比较文化的角度来评价西方的东方学的方法是对的，但我是不完全同意他的分析的：因为不能因西方东方学所具有的意识形态性，就完全否认它其中所包含的“客观性”。以传教士汉学为例，传教士入华肯定不是为推进中国的现代化，而是为了“中华归主”，这种心态对他们的汉学研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但这并不妨碍传教士的汉学

8 爱德华·W·萨义德著 王宇根译：《东方学》第260页，三联出版社1999年。

研究仍具有一定的“客观性”，他们仍然提供给了欧洲一些准确无误的有关中国的知识。采取比较文化的研究方法就在于对西方汉学（中国学）中的这两部分内容进行客观的分析，哪些是“意识形态”的内容，哪些是“客观知识”，二者之间是如何相互影响的。用比较文化的方法来分析汉学（中国学），就是要考察生活在两种文化的夹缝中的汉学（中国学）家是如何在跨文化的语界中展开这种学术研究的，分析他们的在具体的文献和材料背后的一般性的方法，对中国本土学者来说，影响我们的恰恰是方法论这一部分。所以我认为，不能把海外汉学（中国学）中的研究完全归为“意识形态”，加以批判和抛弃。对赛义德的理论应加以分析的运用。

如果有了这个观点，我们就会看到汉学家区别与中国本土的“国学”研究者的主要地方在于学术视野和方法论。例如，法国汉学家马伯乐对中国上古文化和宗教的研究受到涂尔干社会学的影响，从而开创了中国宗教社会学研究之先河，对他这种宗教社会学方法论的吸取推动中国本土的社会学研究。当年杨堃先生受教于马伯乐，成为中国社会学研究中最早采用宗教社会学方法的学者，而中国的宗教学界几乎没有人知道早在近一百年前马伯乐已经创立了这种方法，这两年才开始注意这种方法，但宗教学界的学者们只不过是西方的宗教社会学搬来而已，他们今天也仍不知中国宗教社会学研究的真正创始人是法国汉学家马伯乐。社会学和宗教学在对待马伯乐汉学研究中的方法论的两种态度，对这两个学科的发展都产生了影响。夏志清运用新批评主义的形式主义分析方法，重评中国现代文学史，使张爱玲，沈从文，钱钟书又回到现代文学史的研究视野之中，这种方法极大启示了中国文学史的研究者。在西方汉学（中国学）的中国文学研究中，“20世纪涌现出来的意象研究，新批评，原型批评，结构主义，主题学，文类学，风格学，叙事学，甚至女权主义，混沌理论，文化理论等等，举凡用之于西方文学研究者，几乎都在中国文学研究中派上用场”。⁹新时期的中国文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步西方汉学方法论的后尘。

注意其方法论，注意其新的学术视角，运用比较文化的研究方法，揭示出隐藏在其“客观知识”背后的方法论，这正是汉学（中国学）研究者的基本使命。

四、在世界文化范围内探讨中国文化的影响史

如果说，汉学（中国学）的研究是各国东方学的一部分或地区研究的一部分，那么，它主要是在一种学术形态。但汉学作为对中国文化的介绍和研究，同时也在世界各国的思想与文化中产生了影响，各国的思想家和文学家也从中国文化的丰富内涵和悠久的历史中得到启示，他们也写下各种形式的文字，从而使中国文化走入了各国的思想文化领域。这些人虽然不是汉学家，但他们和中国在思想上和实际上都有着各种各样的联系。对中国文化在世界各国的影响的研究也构成了汉学（中国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部分。

中国文化在域外的传播和影响是两个相互关联而又有所区别的领域，一般而论，传播史则重于汉学（中国学），即他们对中国文化的翻译，介绍和研究，域外的中国形象首先是通过他们的研究和介绍才初步建立的；影响史或者说接受史则已经突破学术的侧面，因为汉学（中国学）的研究在西方仍是一个很偏僻的学科，它基本处在主流学术之外，或者处于学术的边缘。中国文化



在域外的影响和接受主要表现在主流的思想和文化界。但二者也很难截然分开，因为一旦中国文化的典籍被翻译成不同语言的文本，所在国的思想家和艺术家就可以阅读，就可以研究，他们不一定是汉学家，但同样可以做汉学（中国学）的研究，他们对中国的兴趣可能不低于汉学家，特别是在为自己的理论创造时。英国十七世纪的学者约翰·韦伯从来没来过中国，但他所写的《论中华帝国之语言可能即为原始语言之历史论文》的书是西方第一本关于研究中国语言的专著，马克斯·韦伯的

9 周发祥：《国外汉学与比较文学》，载任继愈主编《国际汉学》第7期，第11页，大象出版社2002年。

《儒教与道教》你很难说它是汉学著作或者说不是，但其影响绝不低于任何一本汉学的专著。美国的思想家爱默生，诗人庞德，德国的荣格等都是这样的人，这样的例子很多。因而，接受史和影响史也应成为汉学（中国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方面。

这方面前辈学者已经为我们提供了研究的“范式”，钱钟书在英国时所写下的《十六世纪--十七世纪英国文学对中国文化的接受》，范存忠的《中国文化在启蒙时期的英国》，陈受颐的《中国文化对十八世纪英国文化的影响》，朱谦之的名著《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法国学者毕诺的《中国对法国哲学思想形成的影响》都是我们在做汉学（中国学）研究时所必读的书。

在这个方面，赛义德的理论给了我们解释的支点，“东方学现象是整个西方的隐喻或缩影，实际上应该用来代表整个西方”。这是说西方为了确定自我，他们拿东方作为非我来做对照，“东方代表着非我，相对这非我，西方才得以确定自己之为自己，所以东方乃是西方理解自己的过程中在概念上必有的给定因素”。从十八世纪的中国热，伏尔泰认为中国是“天下最合理的帝国”到十九世纪中国完全失去了魅力，黑格尔认为中国是一个只有空间没有时间的国家，一个停滞的帝国。在西方文化史上中国一直是作为西方确立自我的“他者”而不断变换者。

汉学（中国学）的魅力不仅在于它的“同”——汉学家们为我们的国学研究提供了许多新的史料，特别是在“四裔”研究方面。其实，它的魅力更在于“异”，在于跨文化间的“误读”，在这个意义上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研究是汉学研究的天然盟友，如孟华所说：“作为一个比较学者，我对汉学有着一分天然的亲近感和学科认同感。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自从我踏上比较文学学术之路起，汉学研究就始终伴随我左右，成为我学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¹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海外汉学的研究应将这一部分自觉地列入其研究范围之内。

以上几点都是从域外的角度来看待汉学（中国学）的，即它发生的历史，它本身的学术史及它在本国文化思想史中的作用与价值，但在研究海外汉学（中国学）时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纬度：汉学（中国学）和国学的关系，这种发生在域外的关于中国的学问和我们本土的中国学术有什么关系呢？它对中国本土学术的发展有什么

价值和影响呢？

五、在与国学的互动中把握海外汉学（中国学）的研究

海外汉学（中国学）从其诞生起就同中国学术界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特别是西方汉学，在一定意义上讲中国近现代学术的产生是和西方近现代的汉学发展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中国近现代学术之建立是中国本土学者与汉学家们互动的结果。利玛窦与徐光启，理雅格与王韬，王韬与儒莲，伯希和与罗振玉，胡适与夏德、钢和泰，高本汉与赵元任等等……，汉学家与中国学人的交往我们还可举出许多例子，正是在这种交往中双方的学术都发生了变化，互为影响，相互推动。钢和泰在厦门大学任教，卫礼贤执教于北大讲坛，陈寅恪受聘于牛津、剑桥，在20世纪20、30年代双方的交往比今天还要频繁。就中国来说，正是在这种交往中中国学术逐步地向现代化形态发展。

当年傅斯年在谈到伯希和的学问时说：“本来中国学在中国在西洋原有不同的凭借，自当有不同的趋势。中国学人，经籍之训练本精，故治纯粹中国之问题易于制胜，而谈及所谓四裔，每以无较材料而隔膜。外国学人，能使用西方的比较材料，故善谈中国之四裔。而纯粹的汉学题目，或不易捉住。今伯先生能沟通此风气，而充分利用中国学人成就，吾人又安可不仿此典型，以扩充吾人之范围乎。”¹¹这说明了当时汉学对中国学人的启示。实际上近现代以来，中国学术对西域的研究日益加强，引起许多学者感兴趣，这显然是受到了西方汉学家的影响。胡适在1916年4月5日的日记中说：“西人之治汉学者，名Sinologists or Sinoloques，其用功甚苦，而成效殊微。然其人多不为吾国古代成见陋说所拘束，故其所著书往往有启发吾人思想之处，不可一笔抹煞也。”¹²

这里胡适已认识到汉学的特点，以后胡适在与汉学家钢和泰交往中改变了原来认为汉学家治学“成效殊微”的看法，而是直接向钢氏求教于梵文。而他对瑞典汉学家高本汉的评价更说明西方近代汉学对中国学术的影响，高本汉以治音韵学而著称，胡适说：“近年一位瑞典学者珂罗倔伦（即高本汉）费了几年工夫研究《切韵》，把260部的古音弄的（原文如此）清清楚楚。林语堂先生说：‘珂先生是《切韵》专家，对中国音韵学

10 孟华：《汉学与比较文学》，载任继愈主编《国际汉学》第9期，第11页，大象出版社2003年。

11 转引自桑兵：《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者交往录》第4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

的贡献发明，比中外过去的任何音韵学家还重要。’（《语丝》第四卷第二十七期）珂先生成绩何以能这样大呢？他有西洋音韵学原理作工具，又很充分地运用方言的材料，用广东方言作底子，用日本的汉音吴音作参证，所以他几年的成绩便可以推倒顾炎武以来300年的中国学者的纸上功夫。”¹³鉴于西方汉学的这一成就，他号召青年人要掌握新的研究方法，那时再来重新整理国故，便可“一拳打倒顾亭林，两脚踢翻钱竹江”。

当时西方汉学对中国学界的冲击非常之大，以致陈垣先生说：“现在中外学者谈论汉学，不是说巴黎如何，就是说日本如何，没有提到中国的，我们应当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夺回北京”。¹⁴其实中国近代学术从传统的注经转变为现代社会科学的方法，一个重要因素是受启于海外汉学。陈寅恪任教清华之初，遵循地道的欧洲汉学及东方学方法，讲授欧洲东方学研究之目录学。赵元任和李方桂的语言学研究走出传统的小学，而采取

现代语言学的方法，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受到高本汉语言学研究的影响。这说明汉学和我们自己本土的学术传统有着内在的联系。

（本刊编辑部摘编自作者在
亚洲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2008上的主旨发言）

12 桑兵：《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者交往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

13 转引桑兵：《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者交往录》166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

14 转引桑兵：《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者交往录》139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



亚洲研究动态

Asia Research Network

编辑部

主任 赵宗锋

成员 谷晨曦 王惠英

装帧设计 蔡颖

E-mail: icwar@bfsu.edu.cn

电话: 86-10-88813844, 88813845

传真: 86-10-88813842

地址: 中国, 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2号,

北京外国语大学

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 100089